

当代中国文学学家文库

陈平原

卷

现代中国的文学、教育与都市想像



DANGDAI

HONGGUO

XUEXUEJIA

WENKU



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
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
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

当代中国文学学家文库



现代中国的文学、教育与都市想像



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
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
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现代中国的文学、教育与都市想象 / 陈平原著. —北京: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1.1
(当代中国文学学家文库)
ISBN 978-7-303-11134-3

I. ①现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社会科学—中国—文集
IV. ①C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124635 号

营销中心电话 010-58802181 58808006
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分社网 <http://gaojiao.bnup.com.cn>
电子信箱 beishida168@126.com

出版发行: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.bnup.com.cn
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
邮政编码: 100875

印 刷: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开 本: 155 mm × 235 mm
印 张: 23.75
字 数: 333 千字
版 次: 2011 年 1 月第 1 版
印 次: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: 46.00 元

策划编辑: 赵月华 责任编辑: 赵月华
美术编辑: 毛 佳 装帧设计: 毛 佳
责任校对: 李 茵 责任印制: 李 啸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反盗版、侵权举报电话: 010-58800697

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: 010-58808104

外埠邮购电话: 010-58808083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。

印制管理部电话: 010-58800825

小 引

能入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“当代中国名家文库”，自然深感荣幸。可“荣幸”是短暂的，“惶恐”却成了好长一段时间挥之不去的阴影。因为，在我看来，对于学者来说，编“学术自选集”，其实很冒险。效果好，人家说那是应该的，因为是“精品”嘛；要是不如人意，那就惨了，马上有人兴师问罪：选了大半天，就这两下子，还敢叫“名家”？好在丛书名不是我起的，之所以答应加盟，是希望借此呈现自家某一时段的学术面貌。

这么说是因为，这不是我第一次“涉险”。1997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“跨世纪学人文存”，有《陈平原自选集》；2008年香港三联书店刊行“三联人文书系”，有我的《千年文脉的接续与转化》。前者选录刊于1984—1995年间的论文十四则，分现代文学、小说史、学术史以及当代文化四组；后者收文四篇，集中讨论学堂、报章、演说以及思想文化潮流与“现代中国文学”之关系。轮到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编“自选集”，自然多有规避，选录1996—2008年间刊发

的论文，且格外关注“现代中国的文学、教育与都市想像”。

书编好后，按时间顺序略为排列，发现竟然很均匀。13年间，最为丰产的，也不过年选两篇；绝大多数年份则是“独生子女”。1997年和2001年无文入选，那是因为早已挤进了香港三联版《千年文脉的接续与转化》。真正“歉收”的，是2000年和2004年，屈指数来，那两年正集中精力完成《点石斋画报选》（贵州教育出版社，2000）及《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——明清散文研究》（北京三联书店，2004）。如此铺排，不是为了吹嘘自家“质量稳定”，而是想说明，若我这样的中才，即便手脚勤快，一年也出不了两三篇好文章。以目前学界流行的评价指标衡量，实在是愧煞我也。

依照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规定，选文共分三组，分别对应文学史、教育史和都市研究。至于时间段，则是晚清以降的中国。既然边界清晰，题目显豁，似乎没什么好说的了。其实不然，为了体现自家学术趣味，我还是偷偷埋了三个桩脚。一是学术史，即收入《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——以章太炎、胡适之为中心》（北京大学出版社，1998）的《半部学术史，一篇大文章——现代中国学者的自我陈述》；二是图像史，即收入《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——晚清画报研究》（香港三联书店，2008）的《城阙、街景与风情——晚清画报中的帝京想像》；三是正在苦心经营的“述学文体研究”，即《分裂的趣味与抵抗的立场——鲁迅的述学文体及其接受》。换句话说，选择这十二则小文，除文章本身的水平外，希望体现不同的学术旨趣与方法，且在注重学术的同时，兼及现实关怀（如谈大学那一组）。

各文刻意注明最初出处，既体现自家蹒跚学步的足迹，也是对诸多刊载拙文的杂志表达谢意。

陈平原

2010年2月10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

目 录



上篇 现代中国的文学

半部学术史，一篇大文章 / 3

- 一、学者为何自述 / 5
- 二、自传与自定年谱 / 11
- 三、“我与我的世界” / 17
- 四、“诗与真”的抉择 / 22
- 五、“忏悔录”之失落 / 28
- 六、“朝花夕拾”与“师友杂忆” / 34

新教育与新文学 / 39

- 一、“虚文”之不可或缺 / 40
- 二、“文学史”的意义 / 46
- 三、“桐城”与“选学”之争 / 51
- 四、作为知识生产的文学教育 / 58

思想史视野中的文学 / 61

- 一、同人杂志“精神之团结” / 63
- 二、“仍以趋重哲学文学为是” / 70

三、以“运动”的方式推进文学事业/76

四、文体对话与思想草稿/87

五、提倡学术与垄断舆论/99

六、文化资本与历史记忆/111

分裂的趣味与抵抗的立场 / 122

一、文体家的别择/122

二、论著、杂文与演讲/128

三、古书与口语的纠葛/133

四、直译的主张与以文言述学/137

五、文体的“抵抗”/145

中篇 现代中国的大学教育

中国大学百年? / 153

一、两种大学史/154

二、关于“旁采泰西”/158

三、关于“上法三代”/168

四、敢问路在何方? /176

大学之道 / 178

一、书院之远逝/179

二、借鉴书院的努力/181

三、书院在 21 世纪/190

文学史视野中的“大学叙事” / 192

一、大学历史与大学叙事/193

二、三闾大学与西南联大/196

三、两个北大的纠葛/201

四、故事化了的“老大学” / 205

当代中国人文学之“内外兼修” / 210

- 一、日渐分裂的大学校园 / 211
- 二、大学扩招与“国学热” / 216
- 三、素质教育与通识课程 / 225
- 四、学术工程与评审文化 / 233

下篇 现代中国都市研究**“五方杂处”说北京** / 243

- 一、为什么是北京 / 243
- 二、作为旅游手册的北京 / 246
- 三、作为乡邦文献的北京 / 249
- 四、作为历史记忆的北京 / 251
- 五、作为文学想像的北京 / 254
- 六、作为研究方法的北京 / 257

北京记忆与记忆北京 / 261

- 一、在“记忆”与“忘却”之间 / 261
- 二、城市历史与文学想像 / 264
- 三、穿越诸多学科领域 / 266
- 四、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“北京” / 269
- 五、引而未发的“双城记” / 272

城阙、街景与风情 / 274

- 一、帝国风云与个人游历 / 276
- 二、作为“景物”的宫阙 / 281
- 三、在禁苑与公园之间 / 285

- 四、日渐模糊的风俗画/292
- 五、十字街头的“巡警”/301
- 六、新学如何展开/307
- 七、观察、见证与遥想/315

长安的失落与重建 / 324

- 一、众说纷纭的“西安之行”/326
- 二、何处是长安/332
- 三、爱情、女性还是都城/340
- 四、可疑的“古都”情结/349
- 五、时间意识还是空间想像/356
- 六、如何“遥想汉唐盛世”/362

当·代·中·国·文·学·学·家·文·库

陈平原 卷

上 篇

现代中国的文学

半部学术史，一篇大文章^①

——现代中国学者的自我陈述

“追忆逝水年华”，此乃古往今来无数圣君明相、文人哲士所无法回避的诱惑。不管是出于“自我不朽”的祈求、“文明延续”的领悟，还是功利主义的“以史为鉴”，“追忆”总是人类著书立说时的一大动力。至于追忆往事所使用的文体，可以是书信日记、诗文小说，也可以是随笔杂感、学术著述。反过来说，“追忆”之于各种文类，均有不容漠视的贡献。

“追忆”并非简单的追溯既往、回到过去，而是用“今天”的眼光，赋予“往事”某种意义与逻辑。不只是因为时间的鸿沟，使得往事失落，无法完整呈现；更因为人们只能记忆其愿意记忆的，陈述其能够陈述的。在这个意义上，追忆既是一种呈现，也是一种掩盖；既在讲述真情，也在散布谎言。^② 对此陷阱，不是每个追忆者都浑然不觉。大诗人歌德在谈及其自传《诗与真》时，

① 本文初刊《学人》，第10辑，南京，江苏文艺出版社，1996。

② 周作人：《〈知堂回想录〉后序》，见《知堂回想录》，香港，三育图书公司，1980；[美]斯蒂芬·欧文：《追忆——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》，郑学勤译，2、17页，上海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0。

便对一本正经追忆往事的价值表示怀疑：“生平有些或许算是好的东西是不可言传的，而可以言传的东西又不值得费力去传。”^①自传无法传达不可言传之“意旨”，但起码可以讲述激动人心的“故事”。因而，即便不乏歌德式的疑惑，“名人自述”仍为广大读者所欢迎，其创作与传播自然也就历久不衰。

追忆往事，可以有两种策略：一以自己的生命历程为中心，穿插各种议论；一就某一主题发表议论，夹杂对于往事的回忆。此中差异，不妨以《往事与随想》和《随想录》作比较。20世纪70年代末，巴金译完俄国作家赫尔岑的回忆录，在后记中表达了拜师学艺的愿望。十年后，《随想录》合订本出版，体例却与《往事与随想》迥异：着眼点不在往事，而在对于往事的思考。用巴金自己的话来说就是：“尽管我接触各种题目，议论各种事情，我的思想却始终在一个圈子里打转，那就是所谓十年浩劫的‘文革’。”这座“用真话建立起来的揭露‘文革’的‘博物馆’”，就其“是时代的艺术性概括”而言，与赫氏之作确有异曲同工之妙。^②即便“同工”，因“异曲”而带来的诸多差别，仍不能等闲视之。本文将要探讨的，乃是赫尔岑式的“史中带论”，而不是巴金式的“论中夹史”。

对于往事的追忆，诗人、政客、商家、学者，各有各的拟想读者，也各有各的叙述策略。“瞒天过海”固然是所有追忆的共同天敌，但必不可少“腾挪躲闪”，使得各类“追忆”自然而然地拉开了距离。没有理由认定哪一类“追忆”价值更大，但就接受面而言，学者的追忆，大概最难获得公众的青睐。诗人的激情洋溢与文采飞扬，永远能够吸引广大读者；搏杀于政坛商海并获得功名名利禄者，其纵横捭阖的技巧以及重大决策的内幕，对公众与专家同样具有吸引力。唯独学者的“追忆逝水年华”，很可能既乏浪漫情怀，也无惊险遭遇，以“质朴的文笔”，配“平淡的生平”，可想而知，很难引起一般读者的兴趣。

公众的相对冷淡，并不等于学者的追忆缺乏魅力。不管是着眼于史学价值，还是文章趣味，不少学者的自叙传，令人回味无穷。这里选择

① [德]爱克曼辑录：《歌德谈话录》，朱光潜译，20页，北京，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78。

② 巴金：《〈往事与随想〉后记（一）》，见[俄]赫尔岑：《往事与随想》，1卷，巴金译，上海，上海译文出版社，1979；巴金：《〈随想录〉合订本新记》，见《随想录》，北京，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，1987。

50位生活在20世纪的中国学者的“自述”，讨论其叙事策略及其背后蕴涵着的文化理想，在理解现代中国学术进程的同时，思考“文章”与“著述”各自的功能及自我超越的途径。

在正式论述以前，有关选样标准，必须略作交代：一、王韬和谭嗣同均卒于19世纪末，之所以破例列入，乃着眼于其文化观念及文体意识对后世的影响。二、周氏兄弟及茅盾、郭沫若等，既是文人，也是学者，本文注重其后一侧面。^①三、选择的样本，半为古已有之的年谱，半为西方传来的自传，但为了尊重自述者超越传、谱鸿沟的努力，这里暂不作进一步的区分。四、学者自述，可能今夕完稿明朝刊布，也可能藏之名山传之后世。读者的锁定，自然会影响其叙述策略，但在召唤读者、渴望理解这一点上，二者并无根本性的区别。因此，将当初弟子秘藏的自定年谱，与传主生前刊行的回忆录，放在一起论述，并无大的妨碍。

一、学者为何自述

古已有之的“学者自述”，在20世纪的中国翻新出奇，成为学界与文坛共享的小小时尚。对此“时尚”有促成之功者，首推新会梁任公和绩溪胡适之。梁、胡二君对传记以及自述均有极大的兴趣，且互相启迪。新型传记的鉴赏及写作，梁曾为胡引路；年谱体例的革新，胡则走在梁前头。^②同样欣赏西方的自传，梁氏转而发掘清人“实写其所经历所感想”的自定年谱，而胡君则更多提倡“给史家做材料，给文学开生路”的自传。^③在具体论述中，前者以自传眼光评说年谱，后者则在自定年谱中寻找中国的长篇自传。二者思路仍有共通处，那便是力图沟通古今中外的“自述”。就研究成果而言，梁启超的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和《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》对年谱及自定年谱的论述，远非胡适的随感杂录所

① 比如，《从文自传》写作在前，沈从文成为学者在后，故不录。

② 胡适《四十自述》（上海，亚东图书馆，1933）中提及“我个人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”，指的是“新民说”及学术史研究，但考察其时胡氏发表在《竞业旬报》上的四篇传记，不难发现梁氏另一方面的“恩惠”。1922年胡适出版《章实斋先生年谱》，在《自序》中介绍其体例创新之处，第二年梁启超《朱舜水先生年谱》完成，颇有同工之妙；若干年后撰写《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》，在论及年谱如何“记载当时的人”时，恰好拿这两部作品作例证。

③ 参见梁启超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第十五章九节和胡适《四十自述》的《自序》。

能企及；但胡适从早年的留学日记，到晚年的公开演讲，几十年间锲而不舍地提倡“传记文学”，并且身体力行，完成了《四十自述》及《胡适口述自传》，其影响力远远超过梁启超的专门著述。

不管是梁启超还是胡适，其提倡自定年谱或自传，对撰述者并无阶层或职业的限定。表面上，自述生平，是人人俱有的权利；三教九流，男女老少，均可写作并出版自传。可实际上，自传是一种“最不平等”的文体。传主、谱主的功名业绩，对自传、自定年谱的价值认定及传播范围，均起决定性作用。胡适劝其写作自传的，都是“做过一番事业的人”；梁启超讲得更明白，“自撰谱谱中主人若果属伟大人物，则其价值诚不可量”。^① 回忆录的限制相对小些，但也要求与“名人”略有瓜葛，方能引起读者的兴趣。金克木《天竺旧事·小引》对写作回忆录的困境，颇多调侃语：

名人大抵常有回忆录，回忆的都是一些名人、名胜、大事或者与自己有关的亲切的人和事。名人往往进入别人的回忆录。不名之人也往往由回忆名人和大事而得名。

这种文体的“势利相”，固然不曾剥夺“未名者”写作自传或回忆录的权利，却能有效地阻碍其流通。

统而言之“传记文学”，对作者的身份地位并不苛求；但基本上属于史学的自传及自定年谱，则要求作者有一定的“知名度”。因而，“学者自述”之能否大量产生并广泛传播，主要取决于其是否“知名”，是否有足够的“自信”。换句话说，学者的价值是否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。

20世纪初的中国学者，之所以二三十岁便写作并发表自传（如刘师培、梁启超），与社会转型期先觉者开天辟地的自我感觉有关。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，撰写自传蔚然成风，除了胡适、林语堂等人的大力提倡，更因其时文人学者尚有充分的自信。^② 到了五六十年代，大陆学者

^① 参见梁启超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第十五章九节和胡适《四十自述》的《自序》。

^② 胡适《四十自述·自序》称：“我的这部《自述》虽然至今没写成，几位旧友的自传，如郭沫若先生的，如李季先生的，都早已出版了。自传的风气似乎已开了。”第二年，林语堂在《论语》上发表《四十自叙诗》，接着又用英文写作自传，并由简又文译成中文在《逸经》上发表。1937年郭登峰编《历代自叙传文钞》出版，序言中感谢胡适的指导；同年，林语堂创办的《宇宙风》陆续发表蔡元培、陈独秀、叶公绰、太虚、宋春舫等人自述，后集为《自传一章》，由宇宙风社单独刊行。

极少写作(更不要说发表)自传,主要原因是知识分子处于被改造的地位,根本不敢“扬才露己”。至于其时大量涌现的“思想总结”和“自我批判”,乃迫于外界的压力,不得已而为之,不能作为自传来阅读评判。像吕思勉那样,将《三反及思想改造学习总结》作为自传来写,而且基本上没有违心之论(正因如此,此“总结”30多年后方才得以作为“自述”发表),实在是个奇迹。进入80年代以后,学者地位相对提高,这才有《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》(太原,山西人民出版社,1982—1987,共10辑)和《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》(北京,书目文献出版社,1982—1990,共11辑)中诸多学者撰写的自传。北京三联书店陆续出版的《我在六十岁以前》(马叙伦)、《三松堂自序》(冯友兰)、《韧的追求》(侯外庐)、《天竺旧事》(金克木)以及《吴宓自编年谱》等,对于恢复甚至提高学者自述的信心与兴致,起了很好的作用。到了1993年,远在西南的巴蜀书社,更打出“学术自传丛书”的旗帜,以每种5万至10万字的篇幅,推出张岱年、蔡尚思、钱仲联等一批老学者撰写或口授的自传。

某一时段学者自传大量涌现,最多只能说明其时社会对学者的关注,并不保证这些自述的史学或文学价值。后者取决于学者自述的动机、体例、策略以及欣赏趣味等。这里先从“动机”入手,讨论学者为何在专业著述以外,还要撰写自传或自定年谱。

学者对其为何自述生平,而且公开刊行,大都有所解释。清人自定年谱中,多有追念平生,聊示子孙,俾知起家不易之类的说法。^①这种过于私人性的叙述姿态,基本上不为现代学者所取(罗振玉除外)。对于那些生前便已公开发表的“自述”,再强调“聊示子孙”,未免显得矫情。

有了《论语·卫灵公》中“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”的感叹,自认怀才不遇的文人学者,其自我表彰便显得理直气壮。“去冬咯血,至今未愈,日在药炉火边作生活”的王韬,撰《弢园老民自传》,理由是“老民盖惧没世无闻,特自叙梗概如此”。“未入中年”的刘师培,也都因“百感并合”而赋《甲辰年自述诗》:

^① 参见傅诗《傅雅三先生自订年谱后记》、周盛传《磨盾纪实自序》以及汪辉祖《病榻梦痕录自序》。

恒子著书工自序，潘生怀旧述家风；
廿年一枕黄粱梦，留得诗篇证雪鸿。

虽也有“年华逝水两蹉跎”的抑郁与不平，但更多的仍是踌躇满志。其实，所有的自述，不管其姿态如何低微、谦恭，骨子里仍透出一股傲气。缪荃孙《艺风老人年谱》开篇自称“无可记录”，可马上又是“身历十六省，著书二百卷”，不妨“略志雪鸿”。不管是感叹“平生所怀，百未一偿”，而“忽焉老至”（罗振玉《集蓼编》），还是将人生比作一次“壮游”，只是希望“留一点迹爪”（王云五《岫庐八十自述》），姿态万千的学者自述，其实都脱不开“自鸣”的基本特征。

学者之所以愿意自述，借用卢梭的话来说，便是自信“除了他本人外，没有人能写出一个人的一生”。因为，“真实的生活只有他本人才知道”。为了“不愿人家把我描绘得不像我自己”，^①卢梭创作了《忏悔录》；基于同样的理由，现代中国学者写下了各种各样的自叙传。这种“我最了解我自己”的假设，不见得每个自述者都坚信不疑；或许，《钱仲联自传·前言》中的提法，更容易为作者和读者所接受：“当然自己写自己的事，近似回忆录，总比他人根据传闻而写的要可靠。”即便诚实、严谨的学者，其自述也并非天衣无缝，仍大有可质疑处。这一点，留待下面论述。此处只想指出，认定“自述”比“传闻”可靠，乃支撑起大量学者自传及自定年谱的理论根基。

正因为自述“可靠”，往往被史家视为难得的第一手资料。对于有“历史癖”的作者和读者来说，写作自叙传，因而是个极大的诱惑。钱穆在《师友杂忆·序》中称：“读此杂忆者，苟以研寻中国现代社会史之目光视之，亦未尝不足添一客观之旁证。”而自称阅读过五百种以上的传记文学专集，且促成周作人撰写回忆录的曹聚仁，在其《我与我的世界·代序》中更如此表白：

从我是一个研究历史的人来说，把第一手史料保留起来，
也真的“匹夫有责”了。这是我决定谈谈过去经历的主因。

比起钱、曹诸君“补正史之阙”的自信，《知堂回想录》之故作低调，

^① [法] 卢梭：《忏悔录》，第二部，范希衡译，814、819页，北京，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82。